

郑九蝉 著

郑九蝉文集 第六卷

花城出版社

# 红楼梦

下

郑九蝉文集 第六卷

# 红楼梦

下

郑九蝉 著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郑九蝉文集 . 第 6 卷, 红梦 . 下 / 郑九蝉著 .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360-3302-8

I. 郑... II. 郑... III. ①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0949 号

郑九蝉文集

(第 6 卷)

**红梦 (下)**

郑九蝉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惠阳印刷厂印刷

(广东惠州市南坛西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625 印张 2 插页 380,000 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ISBN 7-5360-3302-8/I·2745

(共 12 卷) 定价: 368 元 (本卷定价: 36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1949年生,祖籍浙江台州黄岩区上郑乡。

1969年,下乡插队黑龙江省绥滨县。

1977年,就读佳木斯师范学校。

1984年,调回浙江黄岩县委宣传部工作。

1985年,就读鲁迅文学院。

1987年,回黄岩市委宣传部工作。

1994年,调回浙江路桥工作至今。

著有作品多部,共约400多万字,其中《能媳妇》等六部中短篇小说,获国家级、省部级大奖;《黑雪》与《浑河》两部长篇小说分别获全国金钥匙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大奖。

我一下子明白了。人类就是在这种不可改变的生死过程之中一代又一代地跟着走过去的。人活着的时候意义，他就一定会做梦。在红色梦幻之中体现了人的真正价值，世惟有在红色梦幻之中，人才能够找到他灵魂的天堂。人不能离开自然早已判定的轨道，然而，他的灵魂可以斗争和磨难中得列升平。人哪人，他最后的意义只有一点，在红色梦幻的追求中，磨明中品尝着人的一切。这是人世间最好的价格。这一下子，我便有了活着的勇气了。我知道我要好好地为大家、为下一代，为将来这个纷苦的世界，为我自己那个年年月月做着梦，活下去，活下去！

作者手迹

# 序

肖建国

郑九蝉和我是鲁院时候的同学。我读七期，他八期。鲁院的前身是中国文学讲习所，新中国建国之初就开办了，断断续续，历三十余年，却只办了六期。到了我们那期毕业时，才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我们第七期的学习时间是1982年至1984年，郑九蝉所在的第八期是1984年至1986年。在第八期学员将要毕业的这年夏天，忽然传来消息，经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拟开设作家班，首届作家班的学员，主要以我们这两届鲁院毕业生中招收。这自然是中国作协和驻北京同学多方努力的结果，这消息使我们十分兴奋。那年我正在一个县里挂职担任副县长，接到通知，我立即选择了读书，辞去职务，和湖南的同学结伴到了北京。我是在到达的当天晚上，第一次见到郑九蝉的。他到我们房间来串门，听说了我的情况后，忽然冒出一句：“都当到副县长了，还来读什么书。”我觉得这话有点不顺耳，但毕竟是初识，却也没有在意。

我们在鲁院安顿下来，找来一大堆复习资料，准备考试。我们都很紧张，也很放松。上午复习功课，下午互相串门聊天，然后便联系周围的单位比赛篮球，比赛乒乓球，天天晚上还操办舞会。郑九蝉当时正在修改一部长篇小说，全然没有心思复习功课，每天关在房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他改稿改得十分艰苦，每天的眼睛都是红红的，脸呈菜色。他偶尔也

出来串串门。他对我们湖南籍的同学有着天生的好感，常常来找我们聊天。他总是一副乐爽爽的样子，直言快语，高声大嗓，哈哈连天，很难设想他是曾经经历过太多艰难坎坷的老知识青年。郑九蝉对体育对跳舞都无缘，但他是我们球队最忠实的观众。每次打比赛，他都会到场，抱着我们换下来的衣服，站在篮球架下瞪着眼睛看。看到兴奋时，常常会不顾一切地大呼小叫，旁若无人，至情至性，无遮无拦。听着那不断发出的欢叫声，你会感觉到，跟这样的人交朋友，是完全可以无遮无掩、坦露心扉的。

考完试，我们接到录取通知书再次在鲁院相聚时，个个都无比地兴奋，都更加才华熠熠，谈吐高阔，挥斥方遒。有一小段时间，每天做的就是：聊天、喝酒、打球。郑九蝉似乎仍然在修改他的长篇，仍然改得很苦。他住的房间的门，永远是关着的。他每天最后一个出现在饭堂时，脸都是青的，眼睛里网满血丝。

忽然有一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们都准备睡觉了，郑九蝉推门进来，乐呵呵地伸直了手跟我们一一握过，说：“老肖，再见了！”我奇怪地问：“怎么，不读了？”他说：“不读了，回去了！”“为什么？”“不为什么。不想读了！”我看他一脸正经，不像是开玩笑，也不像是赌气。我知道他的性格，认定了的事情，就会坚决照自己的意志去做的。我没有劝说，默默跳下床，送他回到房间。

第二天早上起床跑步时，就听说郑九蝉已经走了，搭早班车回去了。我还听说，他走之前，在下面饭堂的拐角处还做了个小小的仪式。我突然就心里格登一跳，觉得九蝉这个人还很神秘的，后悔没有跟他多聊聊。

一别十三年。

去年底，郑九蝉忽然到广州来了。他带了一支文化人组成的小队伍，到广东来学习办报纸的经验，顺便也看看广州的朋友。他仍然是精神焕发，直言快语，高声大噪，一见面就又笑又叫又拥抱，用他强烈的热情感染别人。但岁月的磨蚀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腰背微驼，眼袋呈青紫色，下巴上都有皱纹了。

这次广州之行，九蝉还跟出版社谈妥了一件事情：出版他的文集，十二卷，近四百万字。

这个数字让我吓一跳。

我有点怀疑：他写了有这么多东西么？

郑九蝉的书稿很快就寄到了，在责任编辑的办公桌上堆成了一大堆。他的作品就像他这个人一样，很扎实很“堆伙”地矗放在那里，证实着他的力量和存在。

九蝉的作品主要是两部分：小说和散文随笔。九蝉是在苦难中打过几次滚、死过几次的人，他的体魄，他的心脏，他的思维神经，都已经被苦难的汗水浸泡得格外坚强、硬实。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仍然沉浸在过去苦难岁月的情绪中，所以下笔特别钝重。他就像一个负重在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摆臂，一蹬腿，甚至一声喘息，都特别用力，特别沉重。他的小说作品中，积郁着一种浓重得化解不开的苦难感。他的作品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就是这种苦难感。我总认为，一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苦难感是应该具有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九蝉的小说沉郁厚实，苍凉悲壮，他的散文随笔则是尖锐的，锋芒毕露的。

这跟他的身份有关。

九蝉现在的身份是路桥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商报总编。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必然接触面广，视野开阔。且九蝉生性豪爽



大度，喜欢广交朋友，广结善缘，从他的笔下可以看出，他的朋友是真多：市委书记、市长、部长、局长、科长、办事员，企业家、金融家、投资者、家电产品推销员，作家、艺术家、记者、街头流浪艺人，工人，农民，家庭妇女，修鞋的，拾破烂的，以及看相算命推八卦的……几乎遍布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作家有两种：一种是书斋型的。这种作家以在书房里读书写作为主，偶尔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另一种作家是社会活动型的，他们的主要精力用于社会活动，通过丰富的阅历积累经验（读社会的这本大书），不断激发写作的灵感。九蝉当属后一种类型的作家。九蝉在宣传部副部长、报社总编的这个位置上，真是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既可以直接为社会服务，得到大量的写作素材，又可以有自由的写作时间，随时表达自己的见解。应该说，九蝉是很了解自己，也很了解我们这个社会的。（想起九蝉跟我见面伊始说的那句话：“都当到副县长了，还来读什么书。”这确是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的肺腑之言。）

九蝉的散文随笔内容，主要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传统，也是历代文人议论最多的话题。九蝉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同时也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民政府基层干部。他在基层工作、生活中，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新旧体制交替，中西文化碰撞，大变革，大动荡，社会在大踏步地前进，但伴随而来的，也出现了诸如社会腐败、道德沦丧、人性趋恶等等弊端。九蝉从心里面欢呼社会的进步，也从心里面痛恶亲见亲闻的种种弊端。作为一个人的良知、一个作家的良知、一个政府基层干部的良知，九蝉绝不会沉默。他当然要把自己的感受都写出来。九蝉是写小说的。按照通常的艺术规律，小说需要沉淀，需要精巧周到的构思，用的是曲笔，讲究的是含蓄。九

蝉暂时摒弃了小说这个武器，改写随笔。看得出，九蝉在写作这类随笔文章时，感情是激扬慷慨的，处处流露出他的至情至性。以我在基层工作的经验，官场是最消磨人的个性的，尤其长期担任副职的人，很少有不变得圆滑世故。九蝉的为人、为文，却还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真性情。

这很难得！

九蝉是在北大荒的冰天雪地中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由知青，而工人，而县委宣传部通讯报道组成员，而文联主席，而宣传部副部长，而报社总编，路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下来了。他经历过的一些艰难困苦，是一般人所没有经历过的。他把这些艰难困苦深藏在心里，脸上永远是乐呵呵的，精神抖擞，工作，读书，写作，一路前行。

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生命的力量，既伟大又可怕。——这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北大荒农村插队的时候就理解到了的。有这么一天，我和乡亲们一起种地，种完了地之后，我看到了道边放有一块生了锈的旧铁板。我出于一种孩提式的好奇，把这一块沉重的铁板揭将起来，把剩余下来的豆种全部倾倒在铁板底下。六七天之后，我又经过这里，我看到了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奇迹：那一块生了锈的铁板，竟凭空被抬了起来——离开地面足有一寸多高。这是什么东西在那里作祟呢？我揭起了那块覆着的铁板一看，瞠目愕然了：我倾倒在铁板下的豆种全都发了芽了，小小的黄豆芽竟齐崭崭地把这块铁板顶了起来。从那一天起，我突然间明白了：杰克·伦敦的《渴望生命》，为什么会受列宁欢迎的道理了。因为他歌颂了人生的极致。我也突然间明白了，孙子兵法中为什么要强调‘致死地而后生’，真正的艺术家、思想家，为什么要害怕困难和厄运呢？”

现在，郑九蝉通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把自己的文集奉献在了读者面前，用十二本砖头一样厚的作品，将生命的“铁板”顶了起来，这比他歌颂过的黄豆芽更伟大，更硬扎！

我为他高兴！

19 1973年12月21日，一个极大的喜讯传到我们民生屯：我被推选为省委委员、地委委员，全国劳动模范、十大杰出知识青年代表。在这种轰轰烈烈的名誉下，我觉得我已经挣回我该挣的第一口气。我决定和银江一起回家，这是从1969年11月离开路桥起，第一次探亲，相隔的时间整整四年——

“呜呜……”

58次列车从哈尔滨开往上海，在津浦铁路上飞快地向南奔驰着。车头不时喷吐出滚滚的浓烟。

铁道两旁参天的大白杨树，像风驰似的排倒过去。变了，一切都好像魔术师一样地变了。刚上车之前，我们穿着的是长毛带筒的黑皮靴，现在呢，却穿上了薄薄的单皮鞋了。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茫茫的，甩手无边的大草原，冰天雪地的一片又一片；可是这里却是秀翠似锦，鸟语花香。四四方方的麦田里，麦苗翠绿得可爱，叶尖冲撞，宛若湖泊里荡起的朵朵涟

漪。连垣的远山，翠如云烟。抹上一圈光焰的山岗，浮光耀金，飘飘渺渺。蜘蛛网一般的小河湖汉里，荡漾着小船，又小巧又玲珑，好像一片片飞下来的竹叶。

银江的脸，喷红喷红的，像一朵刚打苞的花。幸福陶醉在她的脸上，更使她添增了几分动人的色彩。然而，在这种时候，我的心里想得就非常的多了。四五年前，那爱珠和我分别的情景，那祥友在大街上肆意地侮辱我的情景，一幕又一幕仿佛是过电影一样，活灵活现在我的面前展现开来。那一些侮辱我的话语，活似一口敲动的钟一样，在我的耳畔里嗡嗡地作响。金九思啊金九思，你总算没白活。路虽艰难，你却总算拱出了一条。现在去边疆的两千多名黄岩、路桥的知识青年之中，哪一个敢与你相比？哪一个又有你这样的荣誉和地位？

我那时候脑海里盘来旋去的都是我回家时的情景：是谁在车站上接我呢？是我那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爸爸，还是多嘴多舌的老妈妈？一路上遇见的同学、老师、熟人，他们将又怎样对待我呢？是惊讶？还是羡慕？路桥啊路桥，四五年没见到过你了，你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是的，我心中非常的激动。但是，那时，在我心中冲动得更多的则是那一种报复情绪，我一路上盘算着报复的只有三个人，一是马银江的父母，我要好好地气一气马银江的父母，你们为什么写这样的信？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地看不起我？二是那个把我完全彻底抛弃掉的那爱珠！为了让马银江的父母好好难受一回——因为回家第一站就是岳家——出上这一口怨气，我偏偏要穿我下乡时发的那一件黄棉袄。为这一身土老包的服装，黄开山气呼呼地批评我：你这个小子真没长好心眼，纯粹是给北大荒人丢脸！我只是把我那嘴唇紧紧地咬在一起不说一句话，马银江早已把我的心思看透了。然而，她不同于别的女人，她知道该如何对付我。

说起来这一次回家，也是怪有趣的：

火车从佳木斯到天津，从天津转车到上海。我俩同坐在座位上，那穿着打扮实在是不相称。银江戴着黑色的金丝边眼镜，上身呢制服，下身是质料很高的裤子，略带点高跟的皮鞋，处处打人眼，叫人看上一眼心里就发馋。而我呢，穿着开花棉袄、大裤裆的棉裤子，一打眼就可以让人看明白，我是百分之百的“土老冒”。稍不注意，就会给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俩根本不是什么夫妻，而是小姐和挑夫。

长途列车中的旅客坐久了，是很容易混熟的。开头，他们认为我们俩是萍水相逢的青年。但是，从我们的相处来看，他们又认为不是夫妻关系，就是亲哥妹关系。因为我们俩的一举一动超过了中国人亘古以来就认定的特有界线。你瞧：这个女人很懒，路都不乐意走，一切都是这个男的去跑。买苹果，梨，上餐车挤饭，下站台打水。休息那时呢——男的遭罪，睁着两只大眼，一动不动，拼命地吸烟，通红的烟火头，常常映着他多皱的脸。女的呢，完全把她的身子靠在他身上。而他总是千方百计，让她休息得更好。待她略一睡熟，他便小心地站起来，把她舒舒服服地放倒在座位上。一件大衣当成枕头，让她垫着；一件大衣，紧紧地盖在她身上。然后，自己两只手插在口袋里，在通道上轻手轻脚地遛达。我这一种彻夜不睡的旺盛精力和如此细腻的伺候，当然得引起旅客们的注意。

一位出差的军官，大概是对我与她的关系发生了一点怀疑，借吸烟点火的功夫问：

“同志，你哪里人？”

“浙江的。”

“在什么地方工作？”

“黑龙江。”

“下乡知识青年?”

“是。”

军人上下打量了这一身穿着：“看来你们那里是真艰苦!”

我淡淡地一笑：“称不上。命运的安排。”

“她是你什么人?”

“妹妹。”

我很不愿意说这是爱人，这是有原因的：从那时候的情况看，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结婚的人还不很普遍。要说在农村这么早地成家，会引起人们嗤之以鼻。我的自尊心是极强的，我决不允许任何人用一种冷笑的目光对待我。

军人看银江昏昏沉沉的脸，又看看我有棱有角、刀刻似的脸庞，也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我俩真的是同胞兄妹。

“你们兄妹一块下乡?”

“对。”

“同一个地方?”

“嗯。”

我不愿意多语，十分简单地回答这些旅客的种种询问。列车过了济南，天已经大亮。铺在我面前的是令我吃惊的一片焦黄焦黄的土地。一畦一畦的麦苗，稍微有一些绿意。我预料到马银江决不会让我穿上这一套衣服进她家门的。果不然，车一靠站，她便使出“磨”的招来。

“我问你，你干么这样穿衣服?”

“很简单，因为你父母瞧不起我。”

“现在不是我父母瞧得起瞧不起的事情，而是你想要报复是不是?”

“我要让你们家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只不过是一个寒酸加潦倒的农民。”

“这有啥好处呢？就算你赢了，他们又能怎么样？难下台的是谁？要依着我呀，偏要好些。用事实来回答他：没你们的援助，我们活得更好！”

“我办不到！”

“哼！我看你的心眼，也只有针鼻子那么大！”

我还是固执己见。说一句实在话，一个已经有刀伤而且至今还是流着血的心，是很难用几句话愈合的。我至今也不明白我那时是怎么啦，他父母小小的一封正常的来信，就会像一把刀扎在我心坎里一样，叫我全身抽搐，喘不过那一口气。

一路上，彼此的心情都很激动，然而，彼此的心情又都很沉重。

两天两夜就在这种难忍的沉默之中过去了。列车发出了最后一声鸣叫，终于精疲力尽地拖着车厢缓缓地进站了。列车上，播放着送宾曲。播音员用动人的声音，介绍着上海的风貌，名胜古迹和出站转车的车次情况。到站后旅客像水一样，从车厢里出来，源源不断地向出口处奔去。

我俩下了车。就在这时，马银江也拿出看家的手段来对付我了。她一屁股坐在火车出口处不走了。

“你这是干什么？”

“我不走了。”

“你不走，我要走了。”

银江赌气地一扭身子说：“你走吧，我死也死在这里！”

我大踏步地走到门口，看看银江偏着脸，丝纹不动，大有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决心。我心软了，又只得转回来。

“好啦，好啦，好啦，你别当众作妖了！叫人好看是不是？我换行不行？”

银江推推眼镜说：“你还得答应我，去！”



“好吧，我答应你：去！”

“我相信你是一个履行诺言的人！”

她这才欢天喜地站起来。我俩出了站口，到了小件行李寄存处把行李存了。然后一起来到繁华的南京路第一百货商店。在巍峨高大的百货大楼里，她东转转西转转，转了整整大半天，这才相中两件衣服，一条裤子，一双好皮鞋。毫不犹豫地花了三百零三元，一把拿了回来。到了旅店之后，她“嘭”地一声关了门，逼着我把那一身破破烂烂的外衣脱下来，完全彻底地扔掉。

“三分容貌，七分衣服”。这一打扮，实在了不得，本来我可以说在男青年中够英俊的了，而如今，这一套衣服使我平宽的肩膀更平更宽，更显端庄；四方脸，衬得更有气质。银江端详了半天，笑着亲了亲我的脸：“天啊，真漂亮！这才叫做不辱使命！”

“行啦！这回你总该满足了把？”

她“扑哧”笑了，又仔细地检查着我身上的衣服，看看有没有漏洞。直到感觉到没有漏洞了，她这才孩子气地说：

“我要叫我家里的人吓了一跳，我要让附近的姑娘全都嫉妒我！”

在上海的旅馆里，我们俩呆了一整天。然后，就给两家各拍了一份电报，报告我们何时到达杭州的车次时间。第二天，又重新登车开往杭州。银江家共有六口人，银江是老大，兄弟姐妹四人。岳父名叫马铁刚，过去是杭州市常委组织部长。岳母过去是一个区的文化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一起来，这两个人差一点同时被扳倒。银江的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以说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从没断歇。那咱，造反派把我岳父抓起，吊在梁上，用铁条子打，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手都伸不